

《修辞学发凡》背后的故事

陈振新

父亲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该书 1932 年初版以来，流传着诸多令人感叹又感动的故事。今年是《修辞学发凡》出版 85 周年，又恰逢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一百周年，特撰文以为纪念。

勤求探讨

陈望道 1920 年到复旦开设“修辞学”课程到 1930 年被迫离开复旦，十余年间不断修改“修辞学”讲义。

他的好友刘大白说：“陈先生底著成此书，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是我在这十余年中所目睹的。十余年来，陈先生底生活，是终年忙碌于教室、讲台、黑板粉笔间的生活。但是他一面忙碌着，一面就利用早上、晚上以及星期日的余暇，做对于修辞学勤求探讨的工夫。”有时为了一种提法，一个例句，他可以同刘大白和乐嗣炳先生一讨论就是几个钟头，直到深夜。一旦发现了更好的例证，他会毫不犹豫地先将原先费力收集到的例证换掉。十几年中更换了多少回，已经无法统计了。最后用到书中去的例句，只是他收集的千百个例句中的一小部分。

一旦从一本书上发现了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的上下文，看所引用的有没有错误，他就会去找原书。如果手头没有这种原书，他就会去各个图书馆找；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会买。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从书中而不能抽头的，他也会不惜重金，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来。到了借无可借买无可买的时候，他还会向朋友多方面地询问，一定要找到此书为止。

陈望道时刻不忘收集古今中外有关修辞学的参考资料。笔者在整理他留存书籍时就发现不但有古文的、现代的，也有日文和英文的，有几十万字的大部头的，也有通俗的薄薄的小册子。记忆中就有六朝梁代刘勰氏的《文心雕龙》，元代王构氏的《修辞鉴衡》等古书，以及近来的唐钺氏的《修辞略》，王易氏的《修辞学》等。

陈望道不单研究修辞学本身，而且还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与修辞学有关的其他学科。十余年间，他对文法学、美学、艺术社会学、因明学、社会意识学、伦理学等学科多有研究，出版了作文法讲义（1922）、美学概论（1927）、因明学（1931）等著作和艺术简论（1928）、社会意识学大纲（1929）、苏俄文学理论（1930）、艺术社会学（1930）等多本译著，如他本人所说：“本书（按指《修辞学发凡》）几篇新稿系根据年来研究文艺理论，社会意识，以及其他一切关联学科所得。”

在勤求探讨中，陈望道除了成书前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修改外，在书出版后一旦发现有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也一定会寻根究底地查阅资料，在下次再版时作补充和订正。例如《修辞学发凡》“借代”格里引的“萧淑兰《菩萨蛮》词”一例，当初从哪儿转引来，已记不清了，从而未注明出处。为了注明出处，他花了许多时间去查找古书，后来终于找到了出处，并在一九七六年重版时注明。

陈望道终于在 1932 年完成了《修辞学发凡》一书的写作。除了七篇是在原来讲义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余五篇全是新稿。不但辞格增了十格，材料也加了三分之一以上。除了辞格的纲领组织和旧稿不同，关于修辞学的根本观念也和旧稿不同，完全换了以语言为本位。书中关于各种辞格的例证，是古语文今语文兼收并蓄。该书出版至今，已被学界公认为我国现

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一个时代的不朽名著。

油印稿本

父亲到复旦后即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写出了油印稿本。他的好友乐嗣炳教授回忆说：“我先后收到过他五次油印稿本，最后又发了一次油印通信，征求意见。”可见在初版《修辞学发凡》问世前曾有过五个版本的油印稿本，但随着岁月流逝，油印稿本只是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长期不见其庐山真面目。

2010 年，笔者在参加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活动中谈及《修辞学发凡》油印稿一事，经人介绍认识了鲁迅沙龙的藏家余唏慕老人。余老说他有乃父留下的一本油印稿《修辞学》，为此笔者约了父亲的关门弟子陈光磊教授专程去了余老家中。余老拿出了其父留下的二册线装本油印稿《修辞学》，该油印稿正文前无目录，书首页右上有“修辞学”三字，右下题“陈望道编述”，书末署“一九三〇年六月五日搁笔”，距正式出版的 1932 年不到二年，很可能是最接近定稿的一个油印本了。又据余老介绍，他父亲余大宝先生 1929 年春至 1930 年夏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实验中学（商科）高中，而此段时间陈望道正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兼复旦实验中学校长，并开设了“修辞学”等课程，此油印稿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的上课讲义了。这是至今我唯一见到过的油印稿本。

该油印稿本，长 27.5 厘米，宽 16.5 厘米，分二册线装，上册 1—89 页，下册 1—81 页，每页折成两面；直行款式，字迹娟秀，墨色均匀，行款版式宽敞悦目。油印稿的不同字迹，显示其应由几位誊写人合作完成。由于余老的珍藏，这个油印稿本虽经历了八十多个春秋仍保存完整，只是纸色泛黄，个别页纸有点发脆。全部稿本页码连贯无缺，虽章节标目及序号的衔接上偶有错杂，但内容是相互接续的，是完整统一的。该油印稿本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特殊版本

这是 1987 年复旦大学陈望道塑像落成典礼上，与先父共事多年的罗竹风先生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他说：我曾买了一部陈望道 1932 年版的《修辞学发凡》精装本，可算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了。另外，我还保存过一部以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特殊版本，可惜没有赠给陈望道同志留作纪念。

他回忆说：

那是 1942 年冬天的事。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我的北大同学苏振民同志（教育系毕业）从胶东中心根据地向东转移，敌人“拉网扫荡”越拉越紧，一直收缩到胶东半岛的牛角尖——荣成，往东就是一片茫茫大海。苏振民同志牺牲在荣成山头的海滩下。敌人“拉网扫荡”结束后，苏振民的战友返回战场，在斑斑血迹中发现了一个绿色背包，外边凌乱地散布着几本书，其中就有《修辞学发凡》，是 1932 年大江书铺出的第一版精装本，淡蓝色套金封面上还溅上了几滴血。这本书辗转到了我手里，一直保存着。它伴随我经历了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整个时期，从莱阳到青州，又到济南和青岛，最后带到了上海。

罗竹风先生继续解释说：《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用科学方法研究修辞学的著作，它以体系谨严，阐述清楚，例证确切，观点鲜明等著称。以语言为本位。书中关于各种辞格的例证，是古语文今语文兼收并蓄。该书出版至今，已被学界公认为我国现

素，确立出一个中国式的、具有独立性格的修辞学新体系。五十年过去了，就整体或全局而论，还没有任何人创造出过更为完备、更为科学、更为现代化的修辞学新体系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待来者的。

台湾地区有关现代修辞学的探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后期，在台湾曾翻印了三十年代陈望道、杨树达、陈介白等人的多部现代修辞学的代表作，其中陈望道于 1932 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为台湾学生书局首先翻印，但陈望道因翻译《共产党宣言》被台湾当局视为危险人物，所以台湾出版界在翻印时，为避开当局检查，把《修辞学发凡》更名为《修辞学释例》予以出版，陈望道的名字也不敢公开引用，从而成了台湾的地下出版物。

更名为《修辞学释例》的《修辞学发凡》，一经出版即广为流传，被不少大学用作教材，而且它的修辞学体系和研究方法被许多著作所仿效和学习。七十年代初，台湾中央大学徐芹庭教授曾撰写了一本《修辞学发微》（1971 年 3 月初版、1974 年 8 月再版，由台湾中华书局印行）。台湾师范大学蔡宗阳教授的研究论文认为：“该书虽然是同时参阅陈望道、杨树达、陈介白所著修辞学专著写成的，但以采用《修辞学发凡》的说法最多。”1975 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黄庆萱又出版了一本《修辞学》书。该书为台湾畅销书，由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75 年 1 月初版，1986 年 12 月增订二版，2002 年 10 月增订三版。其内容探析弘扬《修辞学发凡》可谓最优，引用《修辞学发凡》的辞格而阐发理论也可谓最优。

最后留言

《修辞学发凡》出版后，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前被各大学用作教材，新

中国成立后也被多所大学采用，并被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必读的前一百本参考书的第四本。它的修辞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不但影响后世数十年，被许多著作所仿效和学习，更是培养出了一批批修辞学的研究人才。著名学者郑子瑜、张志公、倪宝元、吴士文等都声称自己是读了《修辞学发凡》，才走上修辞学研究道路的。

陈望道在 1932 年初版《修辞学发凡》中指出：“我以为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略的影响。何况修辞学，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进展的。成事成例的自身既已进展，则归纳成事成例而成的修辞学说，自然也不能不随着进展。”

又说：所以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也不过从空前的大例，抽出空前的条理来，作诸多后来居上者的参考。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推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

他认为：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成规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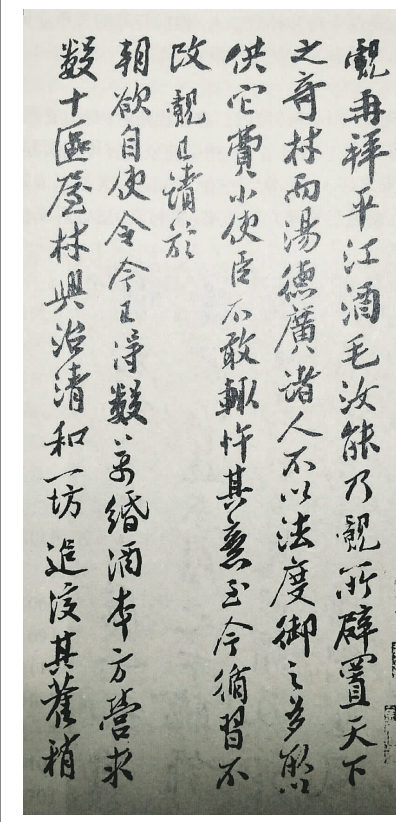
在一九六二年版重印前言中，陈望道更是诚恳地指出：现在是我国一切方面都在跃进的时代，修辞现象方面也有显著的进展。需要我们面对修辞实际，广事搜集，善为总结。特别是关于文体、文风的问题，内容较为错综复杂，而且有些方面近年来变化很大，本书对此又只作了一般的说述，尤其希望有人专心一意地从事，同时又有很多人广泛地探讨，以期我们对它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更为广泛的注意。

以上述说，是意味深长的。

2017/12/12 改稿于 Metamora



老家冬季
写生系列之六
(油画)
肖景志



苏轼的“私生子”问题，现存文献材料并不复杂，然学界专家似多以名人逸闻视之，不值一辨，故至今亦未见有分量的专论。《文汇报》2017 年 12 月 8 日《笔会》副刊登载了秦凌先生的《苏轼身后的“儿子”问题》，以三千字左右的篇幅对之追本溯源，拨开迷雾。文章论证有力，于东坡甚有功劳。然而文中部分文献的引用存有疏漏，故笔者略作辨正以为献芹。

秦先生梳理了明清以来学者的考辨，有蒋一葵、冯梦禎、王士禛、赵翼等。秦先生误将冯梦禎的名字写成“梦祺”，可能是将其与王士禛混淆了。王士禛本名士禛，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后乾隆又赐名士禛。明人冯梦禎（1548—1605）之名一直是梦祺，并未有如此的遭际。针对王士禛等人关于孙覿为苏轼出子的辩驳，秦先生替冯梦禎辩诬，认为后人都误解了冯梦禎，说“冯梦禎（应为“祺”）在《跋孙覿尚书尺牍》中辨明此事”，并引文献如下：

阳美孙老得东坡弃婢而生尚书，实坡公遗体。予跋《鸿庆集》，既辨之矣，顷又考得一事。坡往阳美，憩村舍，见一童子颇聪慧，出对句云：“衙门稚子璫玛瑙。”童子应声曰：“翰苑仙人锦

回音壁

苏轼“私生子”的书法之妙

——兼与秦凌先生商榷

韩立平

绣肠。”坡喜之。童子即覿也。然则遗体之说，益知其妄矣。

初读此材料，似乎冯梦禎有过一番考辨，“知其妄”。然而这段文字其实出自王士禛《香祖笔记》，文中“予跋《鸿庆集》”的“予”是王士禛而非冯梦禎。王士禛《居易录》为《鸿庆集》所作跋文中，已对孙覿为出子说作了辨正：“予按：仲益非君子，且尔时梁师成亦自谗坡公遗体，公安得有如许既振之婢而嫁之？又安得皆金人黄箒附托？适足以辱公耳。”现在“又考得一事”，于是“益知其妄”。王士禛先后两次驳斥冯梦禎，所以赵翼《陔余丛考》谓“王阮亭则力辨之”。

至于秦先生所谓的冯梦禎《跋孙覿尚书尺牍》，原文标题为《跋孙尚书仲

益尺牍七条》，原文如下：

尝过震泽僧寺，见有孙尚书覿仲益手牍数条石刻，大似大苏公书，因徘徊其下久之。今用卿所示手牍七条，与石刻书法无二，杂之书帖中，不能辨也。帖中语及东坡先生者一，而与德固者半。其守时之正，为人之厚，仿佛可见，不独尺牍之工、书法之妙也。首二帖多战笔，似晚年书。闻之毗陵人士，尚书实大苏公遗体，孙老得苏公弃婢而生尚书，畏时禁不能自明，而详其颠末于家乘，则尚书书法其渊源盖有自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64 册影印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第 443 页）

此跋又收入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三〇六。冯梦禎《快雪堂集》至今未有整理本，笔者据影印明刻本标点如上，

苏格兰作家玛葛·丽弗赛的小说《水银》讲述了唐纳德幼年随父母从苏格兰移居美国的经历；在小说的现实层面，他入读波士顿郊区的一所公立学校；然而在想象中，“我真正的朋友是罗伯特，他还住在爱丁堡，他们家的花店开在我原来的家对面”。唐纳德每周都给罗伯特写信，每周都收到罗伯特对他上一封信的回复；唐纳德说他们家很节省，但他去美国各地旅行都忘不了给罗伯特寄明信片。

来到美国第二年的复活节，罗伯特写信描述他们家开着大篷车到乡村郊游。唐纳德没有回复，虽然他每天都提醒自己要回信，但一直拖着，甚至在接连收到罗伯特的三封来信后，他连拆信的冲动都没有，三封信被原封不动地塞进抽屉，再后来，他就和罗伯特彻底断了联系。

读这个段落的时候，我的邮箱里有四封我未及回复的信，都来自艾瓦。艾瓦是我去年来这座美国小城后最初认识的当地居民，在教堂的免费家具派发活动中，我在有关《圣经》学习小组的征询单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而后艾瓦就成了我的老师，每周二中午，我们都会在现已改作商场的旧州府大楼碰面，找一张尚未被食客占领的桌子，在周遭人的咀嚼声和吞咽声中，打开《圣经》，她开始逐条讲解。

她是个善良、虔诚的老太太，我不断告诉自己，尤其当她反复攻击达尔文时，我以她的“善良”和“虔诚”为借口吞下自己的异议，对她报以礼貌的微笑。她相信如此美丽、复杂的世界除了上帝，不可能有别的来由；她厌恶大城市，抱怨芝加哥枪支泛滥，危险丛生；她相信人比动物高等，“真不敢想象很多人把狗当孩子！”她不相信印第安原住民曾在这片土地上惨遭屠杀。

我感激她，感激她每周拨冗授课，感激她在每个节日都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感激她在圣诞前夕为我们每个人亲手制作的什锦饼干礼盒。为了致谢，我送了玛丽莲·罗宾逊亲笔签名的《基列家书》和一罐饼干制作原料给她；也是出于感谢，我在每次婉拒教堂活动时内心都生出无限的罪疚。

去年感恩节我是在艾瓦家过的。去之前，一位在当地已经读了四年博士的朋友告诉我：“每年感恩节，艾瓦都没地方去，只好请一大群中国学生来家里庆祝。”我察觉出话里的刻薄，没有回复，心里默念道：这是一个善良、虔诚的老太太。

我们的《圣经》学习结束于夏天到来之前，《旧约》和《新约》都已完成。艾瓦说：“我们之后还可以每周约见，你可以把具体的章句问题带来，我给你解释。”我答应着，到了暑假的末梢收到她的群发邮件，她在寻找教堂迎新活动的志愿者。两天后又收到她的追发邮件：“我没有收到任何人的回复，但我肯定你们中一定有人在城里，我们应当在开学前相聚。”秋天，她又接连给我发了三封邮件：“我知道你在写长篇，但是偶尔出来聊天对你的学习有好处。”

长篇是我杜撰出来的借口，出于礼貌，我还煞有介事地跟她约过时间，最后以日程表无法调整而顺理成章地作罢。

在艾瓦家过节

钱佳楠

但到今年初冬，我听闻她摔了一跤，右腿骨折，罪孽感促使我参加了后一次的活动，只为探望这位善良、虔诚的老太太。那晚，爱荷华初雪，我们在一座乡间农场的庭院里围着篝火取暖，除我之外，几乎都是新来这座城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他们按捺不住好奇心冒着严寒坐上巡游玉米地的拖拉机，篝火旁只剩下零落的两三人和坐在轮椅上的艾瓦。我来到艾瓦身边，询问她夏天去中国的旅行经历和她的腿伤，她滔滔不绝地说着，红色的火光映在她苍白的面颊上。

那个深夜，我一回家就收到艾瓦的邮件，短短一行：“在农场的活动里，我没有见到你。”

我震惊了，赶紧回信告诉她“在篝火旁和你聊天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啊！”

她次日清晨给我复信道歉，说这恰恰证明了我们应该多见面，还说她发现昨天晚上，她几乎不认得任何人。我请她不用致歉，礼貌地说下次有机会再叙旧。而后就有了这四封我不愿回信的邮件，邀请我今年的感恩节再去她家，说她制作了饼干礼盒给我，说她新年之夜也会在家里组织聚会。最后一封邮件不是群发的，是专门给我的：

“我读了你去年送我的《基列家书》，这本书很难读。而且，成为牧师是多么可悲的命运啊，他们根本不懂得基督教的基本理念。”

末尾，她仍然写：“我希望我们能聚一聚。”

我看完就有按下“删除”键的冲动，然而我最终没有点，也似乎全无必要，因为只需两天，成堆的邮件就会把这封信淹没，杳无踪迹的发件人不会再戳中我的内心。

《水银》中有一段唐纳德和罗伯特故事的后续：唐纳德在美国长到十八岁，回爱丁堡念大学，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罗伯特父母经营的花店。时过境迁，花店已经改作了面包店，店主含糊地说：“他们早就搬走了。”是在这个时候，唐纳德才想起，他和罗伯特做同学的几年里，从未正眼看过对方，两人甚至都没怎么说过话。

丽弗赛把这段插曲结在这里，不做任何解释。而我，在宁愿选择独自过圣诞和新年也不要接受艾瓦的邀请时，明白了这种稀薄又热络的联系为何会发生于唐纳德和罗伯特之间——他们都是被人群弃掷的人，唐纳德给罗伯特写信从来不是因为后者是他最好的朋友，而是因为他嗅到了后者的孤独，因为这种孤独的气质令他确定后者一定会回信，但最终也是因为从罗伯特身上照见的不是友谊，而是唐纳德自身的孤独触及了他敏感的神经。

唐纳德，罗伯特，艾瓦，我，回信，不回信，终不过是孤独的个体自欺欺人的慰藉。

诸脑后，难道书法的魅力真有如此强大？冯梦禎以肯定语气转述毗陵人士的传言，一旦“出子说”得以确证，那么孙覿书法之妙就“溯源盖有自”，得乃父之风。但冯梦禎似乎忘了苏轼曾道过：“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以及“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对于驸马都尉李玮花五百千购得王夷甫帖，苏轼极为不屑，视夷甫为“吾之所耻”，并将这些愤语写成书迹送与友人，赌气似的嘱咐他，一定要等别人出到五百千以上才能卖，哪怕等上五百年（《书赠宗人焙》）。苏轼若泉下有知，孙覿学他的字会作何感想？而冯梦禎如此酷嗜苏字，却于书法鉴赏上丝毫不受苏轼影响，这位“真实居士”着实令人琢磨。换一个角度看，作为藏有《快雪时晴帖》《江山雪霁图》的鉴藏大家，冯梦禎给友人藏品作题跋时，不免也会说一点违心话，总不能学苏内翰那样：尔之所藏，吾之所耻。

要之，对于孙覿为苏轼出子这一传闻，冯梦禎绝对是“煽风点火”者，后来王士禛的批驳很有必要。秦先生说冯、王之间“看法并没有不同”，乃是误引材料所致。